

一个反动的理论体系

——“四人帮”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董辅初

“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的。为了适应这种反革命需要，书中炮制了一个荒谬反动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臆造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为出发点和黑线，以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胡诌为媒介，歪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以论证“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为基本任务，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提供理论根据。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①由此出发，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②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它归根到底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终极动因。“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这本书则从根本上篡改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把它颠倒过来，头朝下地置于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书上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诬蔑为所谓“唯生产力论”，实际上宣扬精神、上层建筑的因素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终极原因。

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成为公共财产，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上层建筑的巨大作用是以前的社会所不可比拟的。那末，能否说到了这时，上层建筑，特别是人们的思想意识成了最终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再起作用了，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过时了呢？当然不是这样。恩格斯说：“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③。恩格

①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②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③ 《致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斯的这段话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完全适用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作用不管有多大，归根到底总是在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反作用。

这本书则把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篡改为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终极的动因，公开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下面我们全文抄引书上的一段话：“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逐步地消除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趋向完善，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以促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击退资产阶级的任何反抗，不断地揭露和批判党内资产阶级，揭露和批判党内资产阶级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堵绝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这里不想涉及这段引文中的其它谬论。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全被排除在基本任务之外；它只讲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反作用，根本不讲发展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完善的最终的决定作用；发展生产力只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趋向完善”、“广大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不断提高”的结果，而不是归根到底是它们的原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当然是重要的，忽视这种反作用是完全错误的，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完善，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物质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来谈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谈“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堵绝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都只能是空谈；否定这个基础，否定生产力的最终的决定作用，无论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说得多么重大，都不过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胡言乱语。上面那段引文就是这本书以历史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高度概括。

如果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那末首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因为它是实现其它各项重要任务的物质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①。这本书却诬蔑这种观点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所谓“唯生产力论”，胡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胜利是重要的，但决不是第一位的东西”。换句话说，它只不过是第二位、第三位以至是末位的东西。这不是历史唯心主义又是什么？

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来说，它归根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这本书回答说：“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关键，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一样，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巩固和完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生产力的发展无足轻重，只要人们有一种善良的愿望，对“资产

^①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阶级法权”加以限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可以巩固和完善了。这不是历史唯心主义又是什么？

此外，这本书借以进行分析和推理的方法也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胡适提出了一个反动的口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本书在论证方法上奉行的就是这种实用主义，而且比胡适的反动口号更进一步，可以称为：“大胆断言，胡乱求证。”无论是胡适还是这本书，都不是从对客观事物的具体分析中得出科学的结论，而是虚构的结论在前，再为这种虚构的结论拼凑、搜寻几条“论据”。这本书为了给“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大胆断言“党内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并不断发展，然后胡乱地去寻求证据。请看，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党内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总概念。我们说，党内资产阶级是在生产和交换中形成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必须从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去寻找。”本书甚至连“党内资产阶级”这一概念是否合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政党的关系的基本原理都不屑一顾，就把“党内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正在发展作为既定的结论，然后到“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中“去寻找”它的“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不就是胡适之流的实用主义么？全书从头到尾都贯穿着这种实用主义的论证方法。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然也一分为二，即具有二重性。具有怎样的二重性，是可以研究和讨论的。

但这本书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二重性：一方面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一方面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书上有些地方进一步说是：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由此而形成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矛盾运动过程”，“这种矛盾运动，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执政的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种“二重性”，是在“党内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这个虚构结论下为了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去寻找”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而臆造出来的。

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它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或者说，还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这主要是指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或者更确切地说，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赖以存在的经济关系，即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带有的“旧社会的痕迹”、“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资产阶级权利”，并不是说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们是从旧社会中带来的，但又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的，所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它们将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前逐步

^①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消失。它们的存在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成熟性。表明它是一种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它们并不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作为社会主义的一方同共产主义的一方相对立，更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一方而同共产主义的一方相对立。以最能表明社会主义性质的按劳分配原则为例。它是社会主义分配关系，也就是说，是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说它是不成熟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因为是按劳动进行分配，而不是按照各种剥削原则进行分配，它是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它否定了不劳而获和阶级剥削，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说它是不成熟的共产主义性质的，也是因为按劳动进行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会带来事实上的不平等，所以又是旧社会的痕迹。由此可见，在按劳分配这种社会主义分配关系中，不存在按劳动进行分配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关系的一方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一方的对立，按劳动进行分配更不是作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分配关系的一方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一方相对立。因此，按劳分配这种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并不具有按需分配这种“共产主义因素”同按劳分配这种“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的二重性，更不具有按需分配这种“共产主义因素”同按劳分配这种如书上所说作为“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的资本主义因素的二重性。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从现实生活中还看到，存在着另一类不占统治地位的、不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那种旧社会的残余，例如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某些领导人坚持从事资本主义经营之类，这些残余的旧经济关系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此不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内，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对立物而存在于它之外。我们在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时自然要注意到这一类资本主义的甚至封建主义的旧经济关系的残余对它的腐蚀破坏作用，但绝不能把它们说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

“四人帮”组织编写的这本书所说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是一个有意含混其词的用语。其实，明白点说，它就是资本主义。不仅张春桥下达过黑指示，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资本主义因素，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而且，书上有时也毫不隐晦。例如，书上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可见，在这本书中“资产阶级法权”=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因此，书上所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二重性，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二者的混合。这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性质的恶劣歪曲和丑化。

这本书说的“二重性”，是一种用心良苦的安排。因为通过对这种“二重性”的“分析”，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得出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必然地、经常地要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产生出来的结论。书上说：“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前提。”这里，它玩弄了一个拙劣的把戏。谁都知道，魔术师从一个“空”箱子里变出一只鸭子，这只鸭子不是从无到有“变”出来的，而是本

来就藏在箱子里。同样，在“二重性”这个“前提”中也已经包含了本书想要得出的结论。因为，从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包括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本来就作为“二重性”中“资本主义”那一方面的担负者（书中说：“党内资产阶级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而包含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哪里还用得着再从其中产生出来呢？

三

那末，为什么这本书要以这个“二重性”为出发点并把对它的分析贯穿于全书的始终，使它成为本书的一条黑线呢？就在于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丑化为产生一切资本主义祸害的根源，就是想从这种已经包含了本书想要得出的一切结论的“前提”中推演出本书的全部反动政治结论，特别是“论证”“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有着经济上的“必然性”。而这又是借助于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胡诌来实现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保留着的资产阶级权利，含义是很清楚的，指的是按劳分配中所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这一原则，也就是商品交换中通行的原则，这里实际上的不平等表现为形式上的平等。这种“资产阶级权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所以决不能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可是，在“四人帮”手里，资产阶级权利却成了可以由他们任意瞎说一气的概念，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无所不在的东西。书上写道：“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过程中”。

本书为什么如此重视“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概念呢？因为，按照本书的逻辑，“资产阶级法权”=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基础”，所以，只要宣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可以易如反掌地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当事人自然就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产生了。所以“资产阶级法权”，形式上是本书论述的中心，实际上它是一种媒介，本书正是通过这个媒介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歪曲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要成长为共产主义经济的规律歪曲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必然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全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将不断巩固和发展，成长为共产主义所有制。以此为基础，阶级和阶级差别将最终消灭，三大差别这类旧的社会分工将逐渐消失，商品货币关系将作为历史的陈迹而进入博物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将取代“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正是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看到了共产主义未来的曙光。

可是这本名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却是怎么说的呢？书上写道：“在所有制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由于还存在旧的社会分工，它是产生‘一长制’这种脑力劳动者统治体力劳动者的经济基础”，由于还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它“是一部分人力

求通过商品关系统治另一部分人的经济基础”，由于还实行按劳分配，它“是夏洛克式的人物产生的重要根源”，“总之，……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书上的直接说法是：其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既然被说成是产生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那末，岂不就象张春桥所说的那样，它只是名义上的公有制，实际上是私有制么？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的社会形式，以此为基础，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占有产品，按照劳动共同分配个人消费品，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互助合作的关系。当然，由于存在两种公有制，还存在着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别，人们之间也还存在由于其他旧社会分工所造成的差别，甚至还带有某些阶级烙印。但这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

但是，这本名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则宣称，由于“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因而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依然是阶级关系”；在“相互关系方面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和严重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彼此斗争的过程”，“反映到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书上还竟然说：“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主要就是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这四个阶级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关系”，把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视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当事人。更有甚者，这本书还说什么：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也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本书作者曾经公开声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可以理解为阶级对抗关系，因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关系，所以是阶级对抗关系”，并且明确地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也不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外，而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总之，这本书以宣称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为媒介，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劳动人民之间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歪曲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关系、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关系。

这种“理论”的荒谬和反动，是十分明显的。既然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两个友好的劳动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内部各部分人之间的关系，劳动人民就是劳动人民，怎么能说里面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呢？诚然，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劳动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上还会有反映，农民还保留有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其中的富裕中农还有比较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从工人和农民中还会有少数人堕落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要巩固和发展劳动人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工人阶级的自我教育，坚持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劳动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要不断清除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影响，也就是说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是，不能够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劳动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上的一些反映，就得出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归根到底也是无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关系的结论。从劳动人民中堕落成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那少数人，既然是新资产阶级分子，就不属于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同他们的关系就不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纵如书上所说，“新的资产阶级在劳动人民中产生，有一个过程”，那末，所谓“正在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蜕化变质前也还是劳动人民内部的一分子，不能说他们构成劳动人民内部的资产阶级。

这里还要简单谈一下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否属于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方或当事人的问题。

在我国人民大革命过程中和经过土地改革以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被剥夺了全部生产资料，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分子已成为被专政的对象，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没有它们的份，因而不能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方或当事人。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已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只拿定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定息也没有了。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在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正在被消灭中的剥削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结成的关系，因此也不属于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方或当事人。

这种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关系的“理论”，其荒谬和反动，当它被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再生产时就更加暴露无遗了。

社会主义再生产是物质产品的再生产，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就是：它再生产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同占有产品、按照劳动共同分配个人消费资料的集体劳动者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继续进行和不断扩大，劳动人民之间这种互助合作关系将不断巩固、扩大，并在将来逐步发展为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将创造出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并把资产阶级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使它最终归于消灭。

可是，这本书却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说成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差不多。书上胡说，由于“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一极要再生产出无产阶级，一极要再生产出资产阶级。书上写道：“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既要认识资产阶级那一方，又要认识无产阶级这一方。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一方面会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也必然会不断壮大着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这真是一段奇文！看来，本书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颇为“偏爱”，用了“不断壮大”的褒词，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则只是“不断分泌”。殊不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这种情况下的“不断分泌”，还不就是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壮大”么？那末，什么叫“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呢？不言而喻，就是“不断分泌出”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不断分泌出”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竟然要“不断分泌出”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这不是热昏的胡话又是什么？

通过对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分析就涉及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问题了。这本名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给自己提出了“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转变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的任务。但是它“分析”出怎样的“规律”呢？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将逐步成熟起来，逐步成长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虽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客观规律将为自己开辟道路，共产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这本书则通过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胡诌，歪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实际上宣扬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的规律。书上说：“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和痕迹也将随着再生产出来”，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一时的现象”，换句话说，就是必然的、经常的现象。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然结果。按照这种说法，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在扩大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将不断地在扩大的基础上再生产出来。这样发展下去，不就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么？或许会问：书上不是也说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也必然会不断壮大”么？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怎么可能并行不悖地发展呢？既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那末社会主义怎么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又怎么能“壮大”呢？难道资本主义不是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的瓦解和破坏才能发展么？社会主义都将不保，又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呢？这一点连编写者自己也感觉到了。书的序言中哀叹，“回头来检查，我们的一些分析还是肤浅的，……没有深入分析在何种条件下共产主义因素将要战胜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在何种条件下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将要泛滥起来淹没共产主义因素”。一本自称以“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转变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为“基本任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竟不知道“在何种条件下共产主义因素将要战胜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真是既可悲又可笑！表面上看，是“四人帮”作茧自缚，被自己作的“二重性”这个茧缚住了，使自己陷于不能摆脱的理论矛盾之中。但实际上，它表明“四人帮”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的破产。“四人帮”既要反对社会主义又要装着拥护社会主义甚至热心共产主义；他们既要复辟资本主义又要装着反对资本主义。为此，他们竭力把社会主义歪曲和丑化为资本主义，从而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号下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竭力鼓吹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从而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号下通过破坏社会主义来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这种反革命两面派的表里矛盾就表现为上述理论上的矛盾。这套以臆造的“二重性”为出发点和黑线的理论体系的矛盾是适应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需要而炮制出来的，而他们炮制出的“二重性”的推演结果则又暴露出他们的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

* * *

如上所述，这本书把“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作为出发点和黑线，其目的就是要论证“党内资产阶级”必然地、经常地要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中形成和发展。但是，本书并不是到此止步了，而是进一步胡言：“党内资产阶级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一面孵化着新的资产阶级，一面保护着老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党内资产阶级”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产生出来以后，反过来成为母鸡，又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从“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蛋中孵化出新的资产阶级。不仅如此，它还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下更多的蛋，以孵出更多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于是，蛋生鸡，鸡生蛋，蛋又生鸡，鸡又孵蛋，循环往复，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分子越来越多，“党内资产阶级”“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从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那末，从这里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能有两条：一条是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等这些“产生资本主义”的“祸根”铲除掉。虽然书上还没有敢直截了当地这样说，但从这个反动理论体系中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四人帮”也是这样干的。他们打着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号，到处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条则是把“党内资产阶级”“消灭”掉。书上说：“只反对党外资产阶级，不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事实上起了保护整个资产阶级的作用。只有首先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才能在阶级斗争中的一个战役中从根本上打击整个资产阶级。”书上到处闪现着对革命的老一代作为“党内资产阶级”大肆杀伐的刀光剑影。这本书就是这样以它的那个荒谬反动的理论体系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了理论根据。

马克思说：“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①。对于“四人帮”组织编写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学也应该如此，必须把对它的批判进行到底！

^① 《关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8页。